

全球智库半月谈

克鲁格曼：TPP 不算啥

乌克兰和 IMF 改革

资本市场是创新的唯一伙伴吗？

超大规模自由贸易区对中国和印度的影响

别被数据误导：中国仍是 FDI 首选地

向中国的金融系统注入一些风险

本期编译

陈 博

程覃思

郭子睿

黄懿杰

黄杨荔

孔莹晖

刘 洁

李 想

马文龙

苏 丹

许平祥

周 乐

赵 洋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匡可可	国际金融	魏强	国际金融
	茅锐	新兴市场	陈博	科研助理
	黄懿杰	科研助理	李想	科研助理
	孔莹晖	科研助理	黄杨荔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黄杨荔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克鲁格曼：TPP 不算啥 4

导读：克鲁格曼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专栏中称，TPP “没啥大不了”。本文简述了克鲁格曼反对 TPP 的意见：首先，他建议将政治资本投资于国内经济而非 TPP；其次，他认为，由于当前关税水平已经很低，TPP 的好处微乎其微。本文指向克鲁格曼专栏文章中的更多信息，即全球化与政治驱动自由化的时代将要终结。

乌克兰和 IMF 改革 6

导读：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其面临的数百亿美元债务黑洞再次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置于聚光灯下。然而 IMF 能否更好地帮助像乌克兰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度过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意在给发展中国家更多话语权的治理改革能否顺利推行。但是由于美国的阻挠，这项改革已被拖延三年半之久，预计今年仍然希望渺茫。对此，参议员 Lindsey Graham 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全球治理

资本市场是创新的唯一伙伴吗？..... 9

导读：无形资本是知识经济增长的关键，因此创新型企业的资金来源至关重要。以往都认为资本市场能够为创新项目进行融资，本文认为信贷市场也可以成为创新的好伙伴，但在金融危机时期，信贷枯竭并且支持创新的效率下降。文章最后还为欧洲各国政府发展无形资产提供了政策建议。

信任：国际银行间交易的核心 14

导读：金融危机之后，银行间信心被“有毒资产”严重破坏，导致银行间交易行为大幅下降。信心是这一切的核心。美国采用了压力测试，以帮助市场辨别健康和不健康的银行，而欧洲类似措施则未达到同样的效果。作者讲述了这其中的博弈机理。

是否可能有多个国际货币？从石油市场的历史谈起 16

导读：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依旧保持主导地位，最明显的标志为美元一直是国际石油市场中的专用货币。本文指出即使在石油这样同质性极强的市场中，也存在使用多种国际货币的空间。

经济政策

印度-日本 CEPA 对东亚经济区域主义和 RCEP 的影响 19

导读：随着全球经济重心越来越倾向于亚洲，东盟 10+6 (ASEAN+6) 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蕴含着新的意义。新出现的诸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 (CMIM)、东亚日中韩三边的自由贸易协定等组织都将印度排除在外了。本文从印度与日本在经济方面的互动关系出发，阐述了印度-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CEPA) 是如何消除经济区域主义方面的概念性歧义并提供相应支持的。

超大规模自由贸易区对中国和印度的影响 21

导读：停滞的多哈回合谈判已引起对区贸协定的重新关注。目前，有三个超级区贸协定谈判正在进行，两个在亚太地区，一个在大西洋，它们都希望以此重置全球贸易规则并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议程向前发展。那么，对处于区贸协定边缘的大型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和印度，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些协议可以迫使这些亚洲经济体遵循工业化国家设置的新贸易规则吗？本文探讨了超区域贸易协定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改变了 WTO 所倡导的多边游戏规则，以及由此给中国和印度带来的影响。本文认为区贸协定对中国和印度的影响不会完全是良性的，在中期来看，这些经济体不会接受新的高标准规则，而会出现新的经济治理体系，构建出双重的管理制度。

聚焦中国

别被数据误导：中国仍是 FDI 首选地 25

导读：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东盟五国 FDI 超越中国，成为 FDI 首选地。但中国商务部和外汇管理局的 FDI 数据相差悬殊，外管局的数据考虑了再投资部分，与其他国家的数据更具可比性。外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仍是 FDI 首选地。

向中国的金融系统注入一些风险 28

导读：日前，中国批准成立首批 5 家民营银行；同时，“超日”债成为首支在国内发行的违约债券。本文作者认为，这两件事对中国金融系统都是好事，违约事件将逐渐纠正投资者的道德风险，而民营银行则作为扭转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试点。

中国的区域与双边贸易协定 30

导读：本文介绍了中国目前的贸易协定，并由此推测中国的相关谈判策略，以及这些协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战略观察**中国为什么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投弃权票？ 32**

导读：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克里米亚归属问题所举行的表决上投了弃权票，但是这并不会影响中国同俄罗斯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国投弃权票是出于维护自身领土完整的考虑，但是也为西方国家所接受，因为这达到了孤立俄罗斯的目的。克里米亚问题客观上为中国制造了战略机遇，中国成为美国、俄罗斯和西欧各方争取的对象，而这也为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增添了变数。

平衡透明度和国家安全 35

导读：政府支出的透明度是议会和公民社会有效参与政治进程中的先决条件。但是当涉及到军事预算问题时政府往往不够透明，这会对民主和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在透明度和国家安全关切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可能有助于减少紧张和冲突产生的根源。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西方国家需要针对俄罗斯的弱点采取新的威慑战略 38

导读：乌克兰局势持续升温，本文中俄罗斯欧亚问题专家约翰·洛（John Lough）就西方对俄罗斯的下一步动作应采取的措施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当前西方最主要的是要给予乌克兰一定的经济支持并针对俄罗斯在经济方面的软肋，向莫斯科释放一定的威慑信号。

促使形势不利于朝鲜 40

导读：联合国的一个专家小组裁定朝鲜犯有反人类的罪行，而中国则谴责这份报告的内容不正确。中国更关心的是朝鲜去核化而不是它的人权状况。为此，对外关系委员会采访了朝鲜问题高级专家斯科特·斯奈德（Scott Snyder），而后者认为美国和中国是否能共同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仍然有待观察。

本期智库介绍 43

克鲁格曼：TPP 不算啥

Gary Clyde Hufbauer 和 Cathleen Cimino/文 黄杨荔/编译

导读：克鲁格曼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专栏中称，TPP “没啥大不了”。本文简述了克鲁格曼反对 TPP 的意见：首先，他建议将政治资本投资于国内经济而非 TPP；其次，他认为，由于当前关税水平已经很低，TPP 的好处微乎其微。本文指向克鲁格曼专栏文章中的更多信息，即全球化与政治驱动自由化的时代将要终结。编译如下：

在纽约时报 2 月 27 日的专栏中，自称是自由贸易者的克鲁格曼提出，TPP “没啥大不了”。试问有这样的自由贸易者，谁还需要保护主义者？

与这篇专栏标题同样令人困扰的是这位普林斯顿诺奖得主为 TPP 提供的含糊的辩护：

- 首先，克鲁格曼向奥巴马建议，将政治资本投资于国内经济而非 TPP。

然而，不仅奥巴马针对国内经济提出的议程为共和党国会议员所阻挠，TPP 的运行也与民主党国会议员的意愿相冲突，因而该建议并非是这两项举措间的政治权衡。

- 克鲁格曼继续道，TPP 的好处将微乎其微，因为当前关税水平普遍较低，尽管 TPP 的达成将为集中于大制药公司的知识产权持有者带来客观的利益。

让我们依次看看这些辩护。

正如克鲁格曼所言，得益于既有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出口商在进入 6 个 TPP 国的市场时已经享受近乎零关税的待遇了（反之亦然）。最惠国关税的平均水平对美国和日本而言已经很低，分别为 3.4% 和 4.6%，对大多数其他 TPP 成员也很低，但最惠国关税的最高值仍然很高——美国对进口 SUV 的关税达 25%，日本对进口牛肉的关税达 39%。

在 TPP 谈判中，比关税更重要的是非关税壁垒，尤其是阻挠跨境商务服务贸易、阻挡获取政府采购合同的规制壁垒。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的计量研究表明，TPP 的商务服务壁垒等价于一定程度的关税，从最低点的 2%（新加坡）到 44%（日本）和 67%（澳大利亚），达到 134% 的最高点（墨西哥）。这么高的壁垒不仅对美国的服务出口商有害，也不利于为国内商业服务支付过高成本的国家。

至于占 GDP 约 15% 的政府采购，WTO 的政府采购协议达到的自由化程度还很低，12 个 TPP 成员中仅 4 个签署了该协议，这意味着所有 TPP 国家的联

邦、州和地区采购这一广大领域的竞争程度近乎为零。TPP 纳税人要承担巨大的不必要成本。

在对 TPP 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更强的观点加以反驳后，克鲁格曼写道，“对大制药公司有利的东西绝非总对美国有利”。即便是药品制造商协会也不会宣称其与美国的利益总是一致。

但关于总体利益一致性的情况如何？美国的竞争力在于创新。创新要花很多钱——约 60% 的美国股票市场市值，如 2013 年时的 14 万亿美元左右，代表着思想这一无形资产的资本价值。在这一关乎存亡的巨额资本面前，知识产权的保护显然处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范畴内。以国际视角观之，如果外国的小公司可以自由提供用于植入软件、娱乐、电子和医药中的好想法，如何进一步为创新融资就值得关注。

除了具体细节，克鲁格曼的专栏传递着更多信息。通过引用国际贸易委员会一项不恰当的计算（进口限制仅花费美国 GDP 的 0.01%）并批评 TPP，克鲁格曼认为，全球化时代已接近尾声，政治驱动的自由化也将结束。一切都过去了。

但全球化时代并没有结束。尽管有强大的政治阻力，当前对政治驱动的自由化的需求正如对肯尼迪回合一样迫切。自由化的新前沿是服务和投资，而非制造业。服务业中潜在的跨境贸易一直尚未被触及：正如 Brad Jensen（2011）的研究表明，美国商业服务型企业的出口量仅占其产量的 4%，与制造业企业的 20% 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在过去二十年内，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速远高于贸易，尽管外向型全球 FDI 存量达 26 万亿美元——约占全球 GDP 的 33%，投资仍然低于其预期的潜力。美国 2012 年的股票市场市值为 17 万亿美元，即美国 GDP 的 106%（美联储 2012）。这一对比再次表明，全球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结论

2014 年，TPP 谈判代表着政策自由化的前沿，其背后的热情远超过多哈回合。根据 Peter Petri 及其同事（2013）的计算，TPP 的达成将使美国的 GDP 增长 0.4%，并使其他成员国的 GDP 增长更多。不考虑地缘政治的影响，如果谈判因美国政治的失败而崩溃，不得不说这将是一件大事。

本文原题为“‘No Big Deal’ says Krugman”。本文作者均为彼得森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3 月刊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乌克兰和 IMF 改革

Daniel F. Runde, Conor M. Savoy /文 苏丹/编译

导读：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其面临的数百亿美元债务黑洞再次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置于聚光灯下。然而 IMF 能否更好地帮助像乌克兰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度过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意在给发展中国家更多话语权的治理改革能否顺利推行。但是由于美国的阻挠，这项改革已被拖延三年半之久，预计今年仍然希望渺茫。对此，参议员 Lindsey Graham 给出了自己的看法。编译如下：

3月13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14对3的票数通过了乌克兰救助方案，并将其送到参议院进行全体表决。该项法案与白宫先前通过的救助法案有所不同，这里还包括2010年在首尔提出的IMF份额改革方案的附加条款。也正是IMF份额改革使得这项法案在共和党一些主要立法者之间备受争议，他们认为这是管理者的一次尝试，以乌克兰危机为借口推行一些不寻常的措施。除此以外，也有一些人认为IMF份额改革事实上是送给俄罗斯的一份“厚礼”。为了回应这些质疑，参议员Lindsey Graham最近总结为什么份额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声称IMF“应当在适当的时候证明自己的稳定性。从长期来看，IMF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工具之一。不推行这项改革会使得我们变得目光短浅”。

Q1：什么是份额改革？

A1：2010年11月，在首尔G-20峰会上，奥巴马政府商讨出一项IMF的改革方案。改革的核心在于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6%的份额，提高这些国家的话语权。这一改革方案的实施会使得这些国家在IMF的投票权增加，同时也会提高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在份额改革之下，美国——IMF最大的持股者且唯一一个拥有一票否决权国家——拥有的份额将会从17.69%下降到17.4%。在改革之前，前十位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中国、意大利、沙特阿拉伯、加拿大和俄罗斯。份额改革之后最多的持有国家则分别是美国、日本、中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印度、俄罗斯和巴西。

这并不是一次没有意义的变化。改革之后，不仅印度和巴西两个国家挤入前10的行列，中国也从第六位一跃升至第三位。此外，总体来看，发达经济体的总投票份额将会从57.9%下降至55.3%，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总和将会从42.1%增加至44.7%。此外，这项改革方案也包含一项新的规定，和

目前根据持有份额规定理事会成员的方法不同，理事会成员在改革后应当全部通过选举产生。欧洲经济体在 IMF 理事会中的个数也会从 10 位减到 8 位。

在这些改革下，美国依然可以在理事会里拥有一席之地，并且比第二大股东的投票权高 11%，从而依然可以对 IMF 的所有法案拥有一票否决权（例如新成员的加入，增加份额，特殊提款权的分配，IMF 协议条款的修正等等）。事实上，欧洲成员在这样的份额改革中要远比美国遭受更大的损失，然而 G20 中所有欧洲的成员国都同意了这项改革措施。

Q2: IMF 份额改革在援助乌克兰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A2: 严格来说，IMF 的份额改革事实上并不是保证 IMF 向乌克兰进行援助的必要条件。目前看来，乌克兰的债务已经超过其份额的 214%，并且还在寻求另外 150 亿美元的资金，这样加起来会达到其份额的 700%。但是 IMF 的确存在允许成员国借贷超过本身限制的规定的规定，例如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目前都处于这种状况。

然而，对于为什么 IMF 份额改革方案会出现在乌克兰救助方案里，一个清晰的诠释是非常重要的。最终，IMF 肯定都会向新政府提供资金上的援助，但需要一些令人信服的理由才能这么做。美国为了寻求援助的资金，需要提供一定的政治资本给 IMF 理事会成员。因此，如果美国最后的确是 G20 成员国中唯一一个不认可份额改革的国家，那么美国之后所有的道德管辖的理由都将会变得不堪一击。这正是其他 G20 国家所希望看到的，这也正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所希望的，这也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所想要的。美国的态度是目前唯一阻碍该方案执行的因素。如果这项改革没有通过，美国今后再希望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Q3: 对于美国来说，改革的成本有多大？

A3: 在 IMF 份额改革实施后，美国对 IMF 的承担的责任将会增加 650 亿美元，达到 1280 亿美元的数目。然而，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美国实际所需要花费的真实成本只有 3.15 亿美元，这主要是由于很多资金将由 IMF 在 2009 为了抵抗金融危机而设立的 NAB 紧急资金提供。这一些资金原本是包含在总统 2014 年预算请求之内的，但并不包含在今年早些时候通过的最终法案之中。乌克兰救助方案资金的参议院版本则是从国务院和海外业务方面的财政预算以及国防预算两方面来筹得 3.15 亿美元的资金。

Q4: 这是送给俄罗斯的“厚礼”吗？

A4: 一些共和党人提出, IMF 的份额改革事实上送给了俄罗斯一份“厚礼”, 因为俄罗斯将会得到更多的投票份额, 并且俄罗斯事实上是最近看到其余的 G20 国家都接受这一项改革后, 才站出来要求美国接受的。严格的说来, 这两点的表述都是正确的, 并且的确俄罗斯(以及印度)最近才迫切要求美国接受 IMF 改革方案。然而, 只有 0.21% 的份额的增加并不会给俄罗斯带来一票否决的权利, 也肯定不会要求他在 IMF 的资金上承担任何的责任。

Q5: 议会如果不通过该项法案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A5: 其他的国家可以试图在不得到美国的同意下通过 IMF 份额改革, 但是由于美国拥有重大决定的一票否决权, 因此一定会持续地阻碍改革的进行, 正如过去三年所做的那样。问题在于, 这样一个延缓方案意味着危机下更少的资金, 与发达国家更少的合作, 以及需要寻找除了 IMF 以外能够提供更多大资金的来源。因此, 如果美国不让 IMF 改革方案通过, 那么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并不清楚。但是美国领导的国际金融机构肯定会受到质疑, 领导机构的权利也有可能被剥夺。最终, 正如其他人所提到的, 这是有关 IMF 在发展中国家中的信用问题。2010 年提出的 IMF 份额改革正是为了维护其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信用的一次尝试, 让他们认为 IMF 已经意识到全球的经济正在发生转变, 东亚、东南亚、南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些国家也应该在 IMF 体系中得到更多的话语权。如果份额改革最终没有成功, 更多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会越来越依靠其他的发达国家作为他们的最后贷款人, 而不再是 IMF。金砖银行也会变得越来越有可能。份额改革的通过将能维护 IMF 的信用, 并且能够保证美国继续拥有主要最后贷款人的领导权。

本文原题为“Ukraine and IMF Reform”。Daniel F. Runde 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全球分析部门的主席, 并且领导繁荣与发展的相关项目, Conor M. Savoy 则是该项目的成员之一。本文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刊于 CSIS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资本市场是创新的唯一伙伴吗？

Carlo Altomonte, Marco Antonielli/文 李想/编译

导读：无形资产是知识经济增长的关键，因此创新型企业的资金来源至关重要。以往都认为资本市场能够为创新项目进行融资，本文认为信贷市场也可以成为创新的好伙伴，但在金融危机时期，信贷枯竭并且支持创新的效率下降。文章最后还为欧洲各国政府发展无形资产提供了政策建议。编译如下：

无形资产是知识经济时代增长的关键，但创新企业却可能难以得到启动资金。因此，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作为创新资金促成者的角色至关重要。Twitter 是个很好的例子，早期种子投资者和风险投资者为其提供了融资支持，这使得年轻的企业家实现了创建一个微型博客平台的想法。Twitter 创建于 2006 年，仅仅 7 年之后，即去年 11 月，就在纽约上市。Twitter 最有价值的资产不是厂房或设备，而是专利和软件，甚至是更为持久性的资源，例如交互设计、用户数据以及 2000 名员工的人力资本。它在股票市场的表现表明了这些资本在知识经济中的重要性。Twitter 出现在美国或许不是偶然，美国拥有世界最为发达的资本市场，使其成为创新企业青睐之地。

Twitter 的故事表明了资本市场对创新活动的帮助，但信贷市场能否发挥同样的作用？原则上说，银行加强对贷款人的监管，可使创新型企业从中受益：在越来越多非有形资产被用作抵押品的情况下，有风险的项目更容易得到追踪。因此，发展健全的信贷市场也应该是创新的好伙伴。所以，比较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在不同国家支持创新的不同之处，是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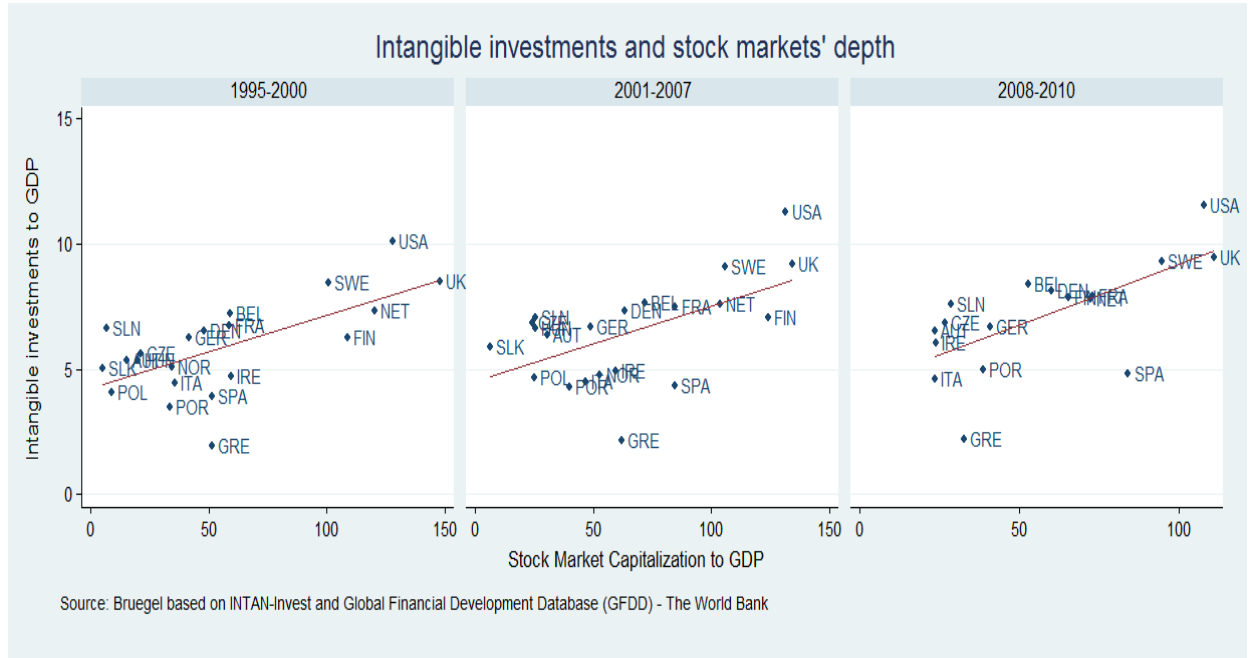
无形资产和资本市场

经济理论表明，创新型企业在为无形资产进行外部融资时面临困难。企业越年轻，项目越有风险，投资回报越难得到准确测度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就越突出。经济理论还告诉我们，金融体系的发展，比如加强对贷款人的监管、风险多样化以及风险管理，可以弥补市场的不完美。这些因素在资本和信贷市场的影响各不相同。

先看资本市场。从量上来讲，资本市场的深度可代表金融发展的阶段。因此，为估算资本市场的长期深度和无形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强弱，我们将股票市场市值占 GDP 的比重和无形资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匹配在一起。图 1 展示

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数据包含了美国、欧盟部分国家以及挪威，按时间分为1995年-2000年，2001年-2007年和2008-2010年三个部分。

图1 无形资本投资与股票市场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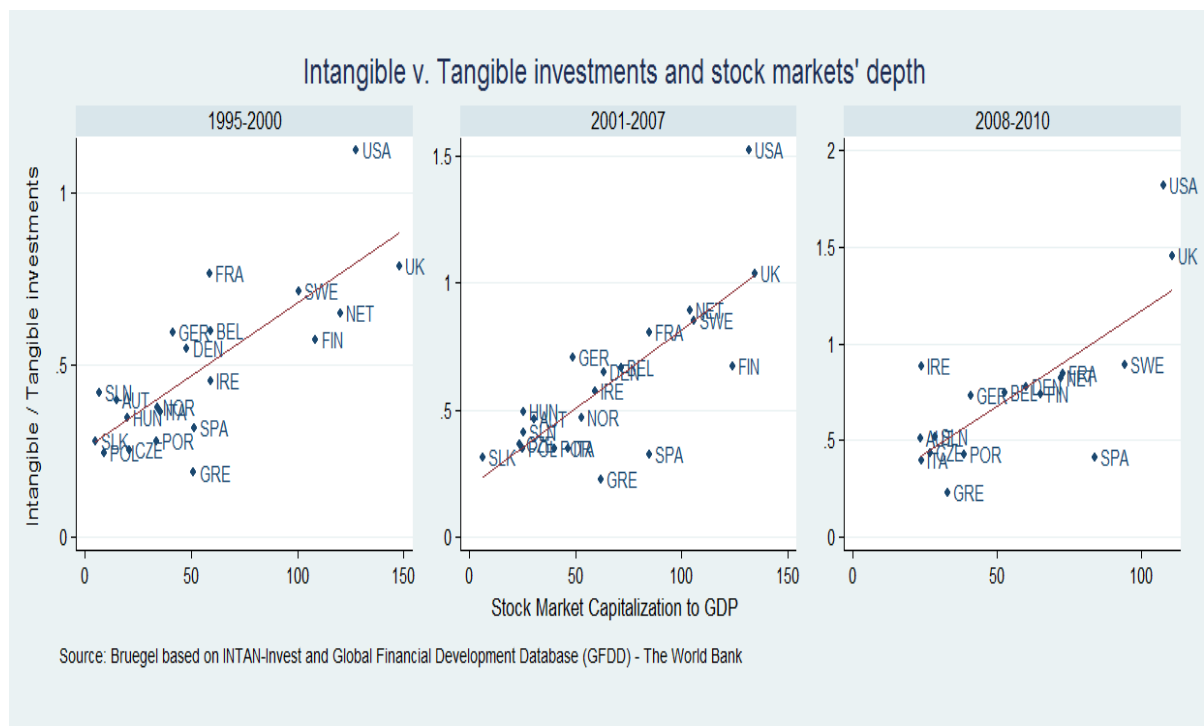
尽管我们观察到了股票市场市值占 GDP 的比重和无形资本投资占 GDP 的比重这两个变量之间有正相关性，但这可能是由外部因素导致的，比如人均 GDP。此外，还有其他原因可以解释这种看起来很强的关系：比如早期的种子投资和风险投资帮助了年轻的创新型企业，而无形资产在这些企业中有很高的的重要性，这使其增加了资本并最终进入股票市场，从而相比那些市场划分不够完全的国家来说，整个市场的规模得到了提高。所以，图 1 所显示的正相关性不仅仅来源于金融发展对已进入市场的所有企业的无形资产投资的影响，而是得益于一种综合的作用，这种作用使得在金融发展健全的市场里，更依赖于无形资产的年轻创新企业，数量相对更多。欧洲缺乏年轻的创新领导者，这或许可以解释它们与美国的差距。然而，用风险资本来解释图 1 中的关系并不充分，因为虽然美国的风险资本高度发达，但在整个欧洲都发展有限，因此不足以解释欧洲国家之间的差距。

另一种解释可能是，相比那些依赖于信贷的公司，上市公司面临的约束更少。因为债权人更喜欢更容易监测到的有形资产，而股权融资或许能帮助上市获取无形资产。实证研究已经表明，创新型企业倾向于更低的债务/资本比。

资本市场 VS 信贷市场：在支持创新上有何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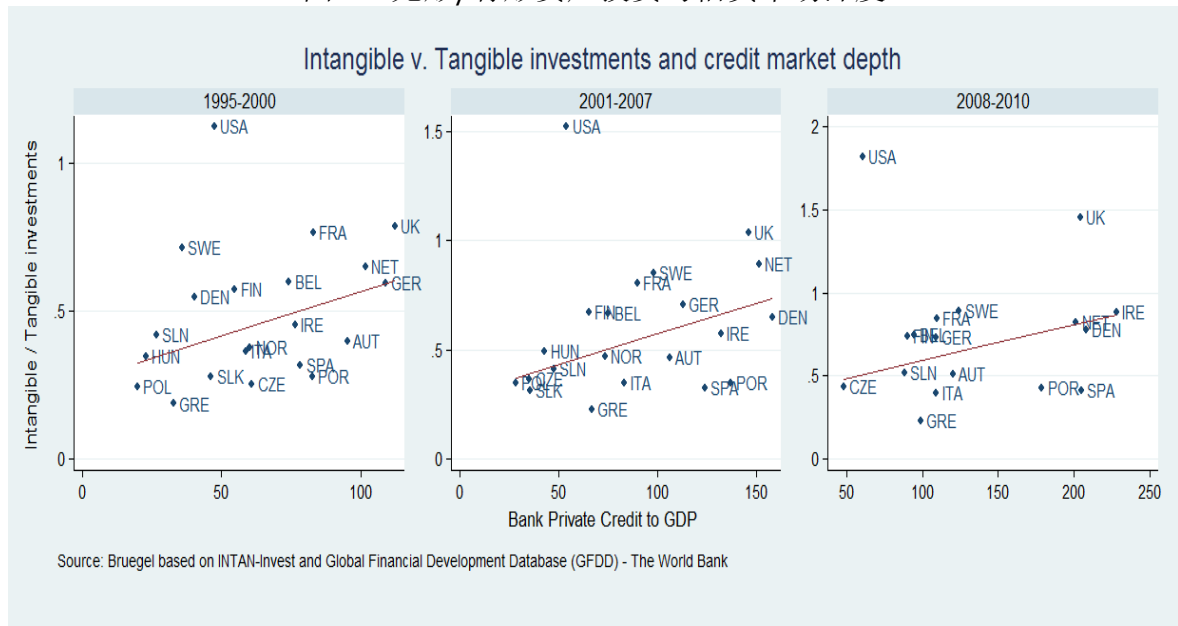
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对无形资产偏好程度有所不同，这说明识别二者差别的关键在于资产的有形和无形，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图 2 在图 1 上稍作了变动，横轴仍然是股票市场市值占 GDP 的比重，纵轴则变为无形资产投资相对有形资产投资的比重。我们观察到的关系是正向的，这说明越发达的资本市场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对无形资产的投资。而因为债权人更偏好有形资产，这一结论在信贷市场上或许并不那么显然。为了进一步探究，图 3 中的纵轴与图 2 相同，横轴变为了银行私人信贷占 GDP 的比重。

图 2 无形/有形资产投资比重与股票市场深度



令人惊讶的是，图 3 似乎支持了信贷越高无形资本投资越高的观点。这样一个正相关性或许可以从支持信贷扩张的因素得到解释。首先是风险管理的改善，减轻了创新项目的评估负担。其次是监管活动的增加，帮助银行跟踪记录较少或没有记录的新项目。最后是合约成本的降低，使得复杂的金融合约得以较好地传送。这三个因素与无形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也在最近的经济研究中得到了证实。

图 3 无形/有形资产投资与信贷市场深度



金融危机时期的无形资产和金融市场

危机如何影响了金融市场与无形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图 3 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危机时期信贷市场对创新投资支持力度下降的假说：从危机时期拟合线附近的分散程度很高，而危机之前的分散程度更低。为使这一结果更为明晰，表 1 展示了每一时期回归得到的系数和均方根误差：危机时期系数更小，误差更大，表明无形资产投资和信贷市场之间的关系减弱。通过比较危机之前表现相同但危机之后表现迥异的国家（比如葡萄牙和爱尔兰，即 POR 和 IRE），可以得到不同信贷市场对于危机的不同反应。表 1 还展示了股票市场的结果：系数更大，误差也更大。这一结果可能对美国和英国的数据较为敏感，如将这两个国家剔除，危机前和危机后股权市场与无形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相差并不大。

表 1 信贷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回归结果

Credit market			Stock market		
	Coefficient	Root MSE		Coefficient	Root MSE
1995-2000	0.0029	0.166	1995-2000	0.0042	0.148
2001-2007	0.0028	0.199	2001-2007	0.0066	0.199
2008-2010	0.0021	0.275	2008-2010	0.0098	0.274

政策启示

无论发展无形资产有多么困难，它们在知识经济时期对增长的关键作用已经无可非议。除了资本市场的关键支持之外，另一个支持的来源或许就是信贷市场。金融危机可能改变了这一联系，不仅仅是因为信贷枯竭，也是因为信贷市场支持创新的效率下降。这对欧洲来说尤其是个坏消息，欧洲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上已经落后于美国，而且高度依赖信贷市场。那么应该做些什么呢？对于整体经济来说，救助欧洲的银行部门仍然是头等大事，与此同时，政府应该跳出一般的创新补贴并鼓励无形资本抵押贷款，或者通过支持公共私营合作制（PPP）以扮演风险资本基金的角色。

本文原题名为“Are capital markets the only friend of innovation?” Carlo Altomonte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t Bocconi University in Milan, Marco Antonielli Research Assistant。本文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刊于 Bruegel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信任：国际银行间交易的核心

James A. Haley /文 陈博/编译

导读：金融危机之后，银行间信心被“有毒资产”严重破坏，导致银行间交易行为大幅下降。信心是这一切的核心。美国采用了压力测试，以帮助市场辨别健康和不健康的银行，而欧洲类似措施则未达到同样的效果。作者讲述了这其中的博弈机理。编译如下：

我最喜欢的维多利亚时代诗人马歇尔·阿诺德曾写过一首哀叹信仰丧失的诗歌，这让我想起近日一位朋友关于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小文章，其中谈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银行间交易行为的剧烈下滑。五年过去了，相较危机之前，银行间资金拆借规模缩减了5万亿美元之多。无怪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欧洲的经济复苏看起来步履维艰。

阿诺德的原诗表现的是在科学日渐昌盛的年代，彼时宗教信仰的确定性正一点点流逝。这和银行间的交易行为有相通之处。毕竟，银行间交易的核心就是信任——一个银行对手方银行的信任。在雷曼兄弟倒闭的那段日子里，随着信任崩溃，银行间交易也随之崩溃。正因为此事关乎信任，银行间的关系难以在一夜之间恢复。不少人想控制这一问题的传染范围，但仅有这样的举措不足以让银行恢复信心。下面我就来解释一下原因。

在雷曼倒闭的日子里，银行突然发现他们的命运同自己手头上持有的不透明资产紧密相连，而他们却无法有效地衡量这些资产的价值。他们无法评估自己资产负债表的价值，也无法评估其他银行手中持有资产的价值。也因此，为了对股东和存款人负责，银行家不愿意承担持有这些资产的风险，即使持有的时间很短。然而，随着银行间交易的冻结，整个金融体系也随之瘫痪，商业信贷开始下滑。

在如此背景下，激活银行间交易是当务之急。美国财长盖特纳就尝试以压力测试的方式，让银行重新建立起对彼此的信心。同时，为避免引发倒闭风潮，政府为银行提供了必要的资源，以满足其资本需求。请注意，这是一个强制性的压力测试，银行不允许退出。如果健康的银行能够免于这一义务，那么其他银行也能以各种理由做出同样的请求。所以这不被允许。

这项过程极为重要。银行非常害怕那些“有毒”资产，因此常常对其他银行的资本健康情况抱以怀疑的态度，这就是所谓的堆积均衡（Pooled Equilibrium）。由于信息不对称，好的产品（或资产）也被认为是劣质产品。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二手车市场。由于一些二手车是劣质车，而且只有工程师才能分辨出来，购买二手车的风险很大。因此，精明的买家会降低对所有二手车的价格评估。但假如所有二手车都只能以劣质产品的价格卖出，那么真正拥有好车的卖家就不愿意在市场上交易二手车，导致整个市场的产品质量下降。

压力测试为市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好银行能被挑出来，从而避免了上述劣币驱逐良币状况的发生。这能让信心逐步恢复。其中的关键在于压力测试是可信的。

但并非所有压力测试都可信。欧洲曾尝试模仿美国的方法，效果并不如意。不少人认为，欧洲的措施并不是为了区分出好银行和坏银行，而是试图让市场相信所有银行都是好的。最主要的困境在于，当缺乏资本和信用支撑时，银行该怎么做。更严重的是，在有毒资产影响范围极广的情况下，压力测试越有效，越多银行会被检验为不合格，对资本的需求也就越强。假如无法重组资本，很可能会引发新的倒闭危机。这就使欧洲陷入了两难。人们普遍相信，为了避免这样的恶果，压力测试不会那么严格，其可信度因此下降。

近日，欧洲再次启动了压力测试。这次将会更加可信吗？

我认为这次会更加可信。欧洲央行责任更加重大，也更加积极，德拉吉也不希望再次无功而返。欧洲的银行急需重铸信心，否则，欧洲很可能继续面临通缩衰退的风险。

本文原题为“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the decline of trust”。JAMES A. HALEY 是美洲发展银行执行主任。本文于 2014 年 3 月 4 日刊于国际治理革新中心（CIGI）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是否可能有多个国际货币？从石油市场的历史谈起

Livia Chițu, Barry Eichengreen 和 Arnaud Mehl/文 程覃思/编译

导读：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依旧保持主导地位，最明显的标志为美元一直是国际石油市场中的专用货币。本文指出即使在石油这样同质性极强的市场中，也存在使用多种国际货币的空间。编译如下：

尽管近年来美国金融系统出现危机，美国主权债务评级遭到下调，人民币成为潜在的竞争对手，然而在许多人的看来，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美元依旧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事实。

美元的主导地位最明显的体现在国际石油市场中专用美元。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WTI）、布伦特原油和迪拜原油价格均用美元表示。美元是几乎所有基准价格的记账单位。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期货市场，该市场仅使用美元报价。在国际石油市场中，不管是即期、定期还是远期交易，不管是哪个国家，美元都是最主要的。

美元在石油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与几个重要的国际经济问题相关，如美元的国际地位，国际货币选择，石油和商品价格对汇率的冲击以及通货膨胀。

美元是记账单位

在国际石油市场中，美元作为主要的记账单位和支付媒介有两个支柱。其一，网络效应，这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一样。石油价格用美元表示和交易是因为美国曾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长达一个世纪，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才被中东超越。然而，在那时候美元已经在定价和交易中广泛使用，对于个别买家和卖家来说，其他货币的替代成本巨大。其二，产品同质性。因为石油是相对同质的商品，所以只使用一种货币进行比价是极其便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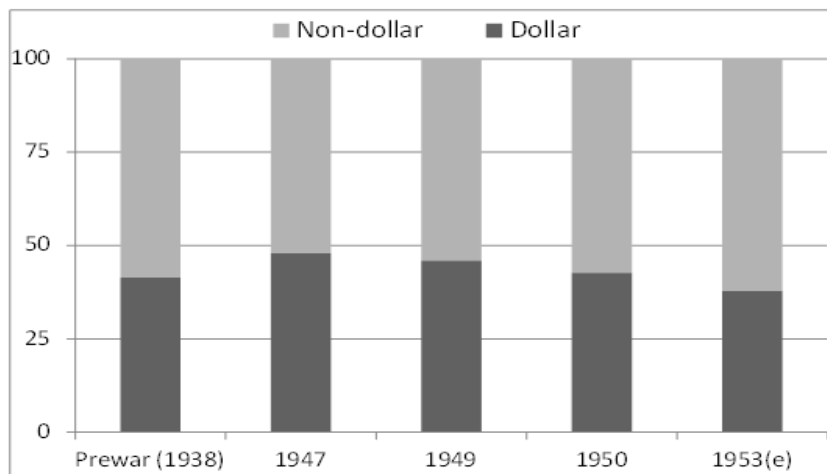
多种货币的空间

根据作者最近研究（Eichengreen, Chițu and Mehl, 2014）提供的证据，网络效应带来的递增收益和产品同质性对于一种货币作为全球石油市场的交易媒介的影响并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强烈。事实上，早期石油交易中使用了多种货币，这表明，即使在石油这样同质性强的市场中，也有使用多个国家货币的空间。根据网络效应的递增收益并非通常想象的那么巨大，先发优势并非一切，

现任优势不能保证成功和多国货币可以成为国际货币，作者得出国际货币市场的“新观点”，石油市场的结论与之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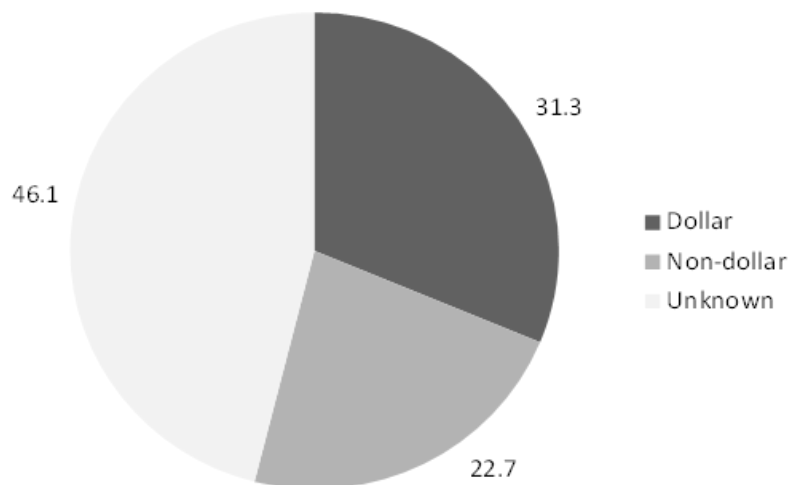
美元和非美元（主要是英国货币）平分了二战前后的欧洲石油进口支出。图 1 表明参与马歇尔计划的 16 个欧洲国家在特定年份里（战前（1938），1947，1949，1950 和 1953）全部石油进口的货币标价构成。尽管，美元是重要的支付货币（平均占到全部石油进口的 40%），但绝不是唯一或者处于压倒性地位的。

图 1 欧洲石油进口的货币标价构成（以进口量表示，%）



有限的证据表明，欧洲石油市场的真实情况与全球石油市场一样。图 2 表明，美元是二战后全球石油进口中主要的支付货币，大约占到 31%。但是，非美元的比例也很大，占到 23%。尽管余下部分（46%）使用的货币信息缺乏，但是至少其中的一部分进口并不使用美元支付。

图 2 二战后全球石油进口的货币标价构成（以进口量表示，%）



结论

不同的国家在国际石油交易中使用的货币不同。我们发现这种差异与该国的贸易关系和该进口国的规模相关。国家币值越稳定越少使用美元；战略动机（如政府影响石油部门）会促使该国更少使用美元；一国受到资本控制使用英国货币受限则会更多的使用美元。但是，我们并未发现支持用流动性偏好效应和国际政治考虑解释货币选择的证据。

这些发现表明，即使在石油这种高同质性的市场中，也有使用多种货币支付的空间；网络效应的递增收益并非想象中那么巨大，先发优势并非一切，现任优势不能保证持续的霸权。因此，从基于美元的货币体系转变成一个多极体系并非是不可能的。

本文原题为“*One or multiple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 Evidence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oil market*”。Chițu 是任职欧央行的经济学家，Eichengreen 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经济和政治学教授，Mehl 是欧央行国际总局的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4 年 3 月刊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印度-日本 CEPA 对东亚经济区域主义和 RCEP 的影响

Ram Upendra Das /文 刘洁/编译

导读：随着全球经济重心越来越倾向于亚洲，东盟 10+6（ASEAN+6）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蕴含着新的意义。新出现的诸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CMIM）、东亚日中韩三边的自由贸易协定等组织都将印度排除在外了。本文从印度与日本在经济方面的互动关系出发，阐述了印度-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是如何消除经济区域主义方面的概念性歧义并提供相应支持的。编译如下：

随着全球经济重心越来越倾向于亚洲，东亚峰会（EAS）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蕴含着新的意义。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形式成立的新团体试图让亚太经贸合作组织（APEC）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得以复活；以更快速度推进东盟 10+3（ASEAN+3）伙伴关系的建立以及提出建立东亚日中韩三边的自由贸易协定时都将印度排除在外了。本文从印度与日本在经济方面的互动关系出发，阐述了印度-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是如何消除经济区域主义方面的概念性歧义并提供相应支持的。

基于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近年来，日本与印度之间的双边贸易有上升趋势。然而，印度对日本的出口额占其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与印度从日本的进口额占其全球进口总额的比重均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这说明两国的双边贸易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同理，尽管日本对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在近期有上升的趋势，但仍然低于其潜在水平。这将为充分利用印度-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协议（CEPA）在其贸易与投资扩张潜力方面的优势奠定基础。

本文进一步指出，在这一背景下，印度-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和执行将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对整个东亚峰会进程将起到决定性的指导作用，其中包括在技术层面上就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行谈判。印度-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在东亚峰会上为一系列议题的谈判提供良好范本。这些议题包括：真实贸易范围的特征、敏感清单以及以某种发展的眼光来制定的原始规则。这都是一些常常在地区经济组织中阻碍谈判进程的议题。比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就有可能发生上述情况，该组织拥有 16 国，但并不存在一小撮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或是有着不同的利益。

因此，本文得出：在东亚峰会上印度与日本都将分别并且一齐参与进来，这并不仅仅能为该东亚峰会的进行提供指引作用。而且，两国的双边全面经济伙伴协议还将成为很好的范本，以期就 RCEP 谈判中几个有争议的技术性经济问题达成共识。然而，文中还提到：并不能仅仅以孤立的眼光来看待印度与日本的伙伴关系，还应充分考虑到印度与中国、印度与美国的伙伴关系。

本文原题为“India-Japa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CEPA) Some Implications for East Asian Economic Regionalism and RCEP”，作者 Ram Upendra Das 是 RIS 所长。本文于 2014 年 1 月刊于 RIS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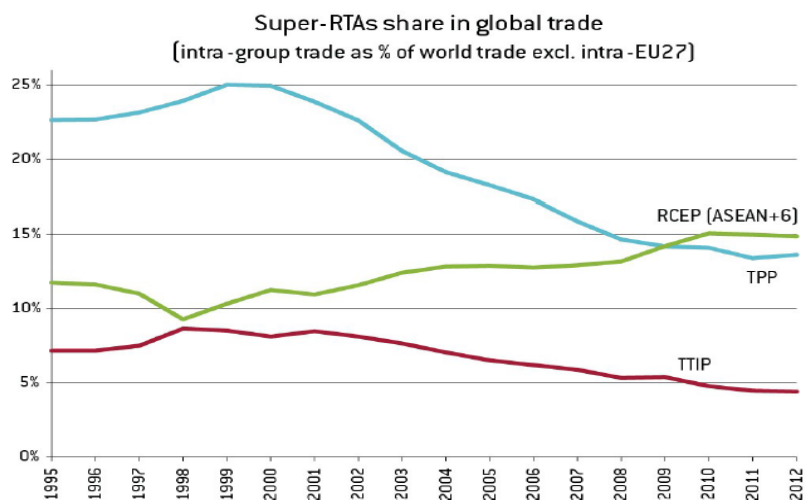
超大规模自由贸易区对中国和印度的影响

Suparna Karmakar/文 许平祥/编译

导读：停滞的多哈回合谈判已引起对区贸协定的重新关注。目前，有三个超级区贸协定谈判正在进行，两个在亚太地区，一个在大西洋，它们都希望以此重置全球贸易规则并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议程向前发展。那么，对处于区贸协定边缘的大型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和印度，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些协议可以迫使这些亚洲经济体遵循工业化国家设置的新贸易规则吗？本文探讨了超区域贸易协定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改变了 WTO 所倡导的多边游戏规则，以及由此给中国和印度带来的影响。本文认为区贸协定对中国和印度的影响不会完全是良性的，在中期来看，这些经济体不会接受新的高标准规则，而会出现新的经济治理体系，构建出双重的管理制度。编译如下：

回顾贸易政策的历史，平凡的 2013 年将会因为多边贸易谈判翻开了新篇章而被牢记。经历了长期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中心的贸易自由化之后，目前超大区域贸易协定开始展示雄风。虽然加入区域贸易谈判的经济体量足够庞大，占到世界贸易总量的 60%；但就其贸易体系设计而言，却是以全球多边规则为基础的。目前，正在谈判的超级自贸区，两个在亚太地区，分别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 或东盟+6）和以美国为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另一个是在大西洋，由美国和 28 个欧盟国家组成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图 1 中给出了三大超大自贸区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例。

Figure 1: Trade within the super-RTA groups relative to extra-EU global trade



Source: Bruegel based on UNCTAD data.

对于非成员国的中国和印度，超级区域贸易协定所带来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 间接破坏作为多边规则的制定者和仲裁者 WTO 的威信。
- 因超区域贸易协定设定“甲板清理”的目标而直接受到影响。

首先，考虑间接影响的情况。很显然，从 WTO 的角度来看，它担心其会越来越成为贸易自由化无关紧要的平台；因为在多哈回合正式形成协议之前，超区贸协定应该就很可能已经成功地实现其雄心勃勃的自由化和协调监管的目标。当然，这仍然有待确定，因为除非参与区贸协议的成员大幅缩减，否则制定出达到其宏伟目标的时间表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区贸协定的缔结会不利于新兴经济体，不仅是因为其排除在条约的形成阶段，更多地是因为在世贸组织主导的多边决策和裁决过程中被赋予的平等发言权以及表达经济增长担忧的权利将受到削弱。超区贸协定的区域主义对中国和印度是一个次优的策略，特别是对他们发展的现阶段而言。

对快速增长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两个直接影响：

- 四方（欧盟，美国，日本和加拿大），在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无关紧要的今天，可以一次性敲定多边贸易协定。
- 没有任何大型的发展中国家，对由四核心成员形成区域贸易协定产生较大的反应。大型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增长，削弱了旧的四国为了满足国内产业相关者的期望和利益而进行全球贸易协议谈判的能力。因此，他们在乌拉圭回合期间非常积极地参与并行使政治压力，而与此对比鲜明的是，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则出现了工业化国家商业游说团体的缺席。

此外，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后几天内，产生了明显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许多反对者让步。但是，正如一个杰出的贸易专家所概括的，“新古典主义框架下‘凡有缔约，必会加入’的时期早已过去”。因此，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集中追求符合国内利益的区域和双边协定谈判。尽管如此，目前 WTO 规则在最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期间运行良好，贸易保护主义几无增加，除去在崛起的新兴市场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结构变化，特别是中国。这一经验强调，尽管世贸组织不能保证市场准入谈判的成功，但其争端解决能力和作为全球仲裁人/规则执行者的作用，目前还未受到质疑。

然而，随着区域贸易协定（RTA）宣称要建立更加坚实而深远的争端解决机制，有一种担心认为这可能与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重叠并冲突。这有可能成为全球贸易治理的一个主要问题。对 RTA 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通常强调的问题是，越来越密集和复杂的国际规范相继出现，这就需要相应成熟的机制，以保证其顺利运行并被准确传达，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关键原因。但是，这样的争端解决机制也开始挑战国际判例的一致性。随着 WTO 的管辖范围扩大，区域法院和法庭的增多，重叠的可能性似乎随之增加。到目前为止，区贸协定已经建立的政府间执法机制相对薄弱，但是这有望在超级区域贸易协定中得到改变。超级区域贸易协定是由以规则导向的强大经济体所引领，如美国和欧盟，他们有意愿和能力来建立更强大的机构，并实施监督和执行机制。

此外，世贸组织和区域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之间有可能存在的管辖权的重叠，这不仅源于其既是 RTA 的义务又是世贸组织的义务所导致的“双重违约”，也源于 RTA 故意创造违反 WTO 的规则。虽然他们保留了“区域”的绰号，但事实上，超区域贸易协定现在涉及到遍布全球的各国，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多边性质，超级 RTA 争端解决机制会继续削弱世贸组织多边贸易的核心作用，加剧地区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规则之间的分歧。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加入到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体系，主权政府将很难控制跨国公司对于投资者和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RTA 争端解决机制将进一步加快侵蚀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就其对中国和印度的直接影响而言，超区贸协定的影响似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其对区域生产网络的潜在影响。区域贸易协定，如 RCEP 和 TPP，通过减少成员国开展业务所产生的管理和监管成本，来支持新兴的国际生产网络。由此，超区贸协定可能优先考虑某些服务行业，如交通运输，电信，信息和通信技术，物流和金融服务，充分利用国际生产和销售网络所形成的优势；但是，这可能很难在新兴市场上得到复制。虽然尚不清楚动态影响路径，但它很可能对目前对处于亚太地区生产网络和供应链核心的中国产生不利影响。

然而，关于超区域贸易协定对中国的潜在影响更为深入的分析表明，未来的区域贸易协定中，把中国排除出区域生产网络和供应链，由此带来的净影响可能不如纯经济方面的影响大。这源于：

- 由于其大部分大型贸易伙伴的已经很低的最惠国关税，超区域贸易协定在纯关税方面的贸易、投资和生产转移效应将比较小。
- 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迫使中国在劳动力成本和其他经济问题上进行再平衡，中国已经开始主动减少出口产品中低附加值的终端产品，而这些产品从关税优惠中得益最多，这进一步缓解了生产网络重组对中国的影响。
- 统一整合 RTA 内部行政规则和监管标准以平滑供给链，可以获得相当于税收的 10-20% 的收益。因此，在 TPP 和 TTIP 中、在超大规模 RTA 谈判的关税互惠、一致性非关税管理和规则制定过程中，让成员国同意深入整合都是个相当艰巨的挑战，这意味着对中国来说最少相当于税收 10% 的损失。

即使假设超大区域贸易协定能引发新兴市场国家深刻的自由化，在不久的将来能实现管理制度的一致性，重组的全球供应链仍然构成对亚洲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威胁，尤其是对中国。这些经济体可能会发生以下三种反应：

- 采纳并升级到这些新的规章和行业标准。
- 选择性地反驳某些规则和生产标准。
- 更高的可能性是，中期内，新兴经济体可能会在关键领域，如产品标准和知识产权上采取特殊的双重监管制度。

本文原题为“Rulemaking in Super-RTA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and India”。本文作者为 Bruegel 的玛丽居里学者。本文于 2014 年 3 月刊于 Bruegel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别被数据误导：中国仍是 FDI 首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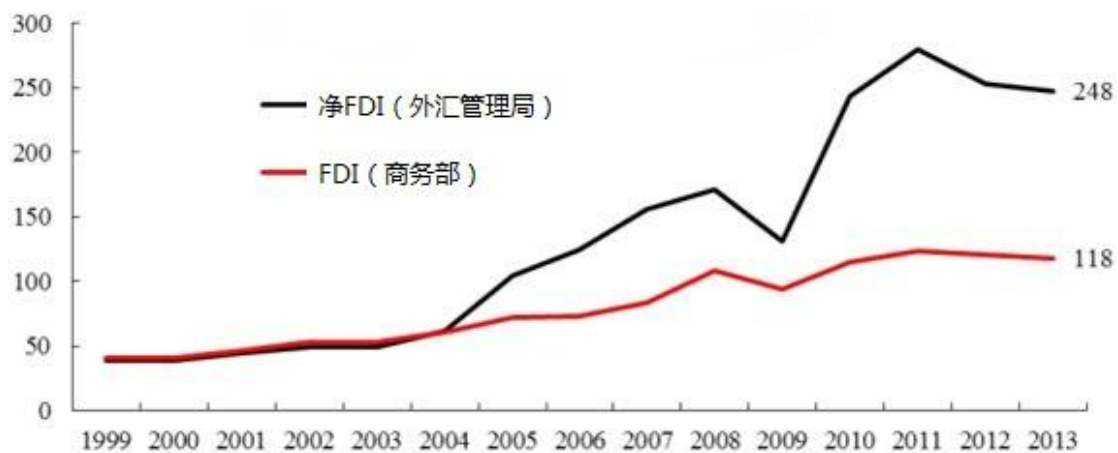
Ryan Rutkowski / 文 孔莹晖 / 编译

导读：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东盟五国 FDI 超越中国，成为 FDI 首选地。但中国商务部和外汇管理局的 FDI 数据相差悬殊，外管局的数据考虑了再投资部分，与其他国家的数据更具可比性。外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仍是 FDI 首选地。编译如下：

东盟五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外商直接投资超越中国，成为跨国公司的投资首选地。然而，仔细考察发现，中国仍是全球 FDI 首选目的地。

中国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均统计 FDI。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 年中国 FDI 只有 1180 亿美元，而外管局的数字是商务部的两倍多。

图 1 1999-2013 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与商务部统计的 FDI（单位：十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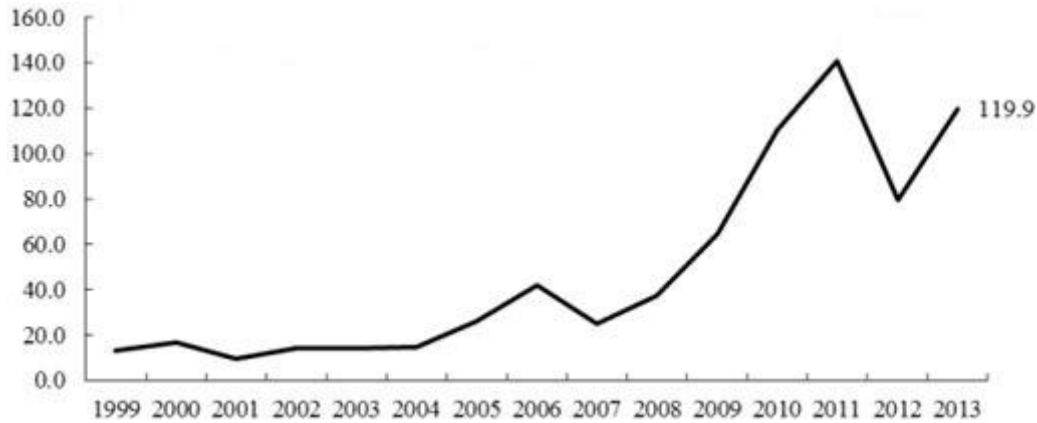


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经作者计算。

注：2013 年净 FDI 根据 2013 年第 3 季度数据估算。

许多分析师使用商务部的数据，因为其为月度数据，且包含了投资国、产业类型、投资结构的详尽信息。然而，商务部的数据低估了中国 FDI。首先，商务部只统计了非金融企业的投资；其次，该数据没有统计外资企业从其母公司获得的贷款；更重要的是，该数据没有统计外资企业的再投资收益。

图 2 1998-2013 年中国外资企业的再投资收益（单位：十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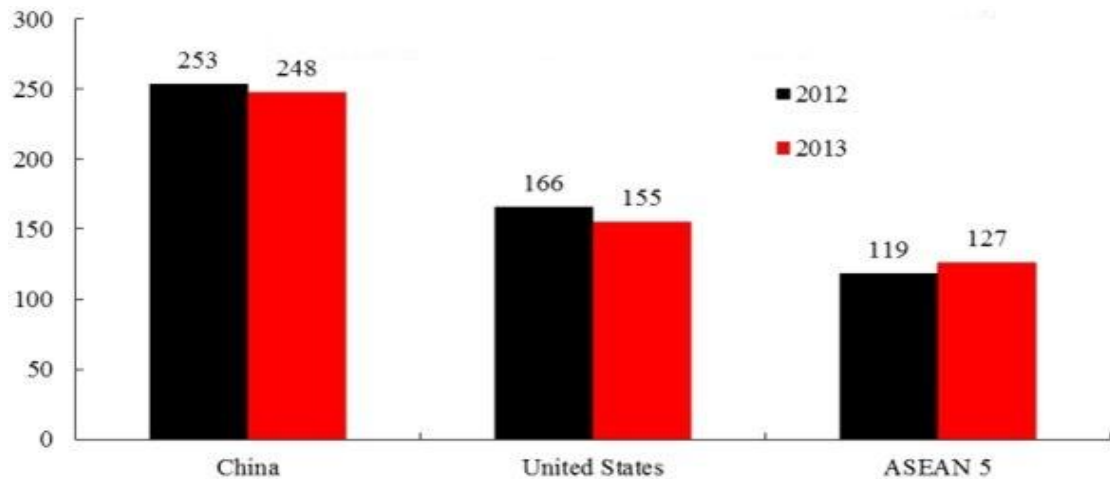


来源：商务部、美国经济分析局，经作者计算。

注：再投资收益根据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再投资在 FDI 收益中的份额估算。

两份数据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在于再投资收益。商务部没有统计未被报告为资本投资的再投资。2013 年，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与外国投资产生的利润达到近 2180 亿美元，根据美国在华跨国公司的数据，至少一半的收益将会用于再投资。而外资企业的资本投资仅为 420 亿美元。保守估计，再投资收益至少能解释外管局与商务部数据差异的 60%。

图 3 2012-2013 年利用国际收支账户计算的 FDI 净流入（单位：十亿美元）



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美国经济分析局、菲律宾央行、新加坡统计局、马来西亚统计局、印尼央行，经作者计算。

注：2013 年美国与中国净 FDI 值根据 2013 年第 3 季度数据估算。

虽然外管局的数据发布不如商务部频繁和详尽，但外管局的数据与其他国家的数据更具可比性，因为该数据是根据国际收支的国际标准统计的。根据外管局的数据，2012 和 2013 年，中国仍是 FDI 首选地。而且，按照当前的增速，中国 FDI 存量继续逼近领先的欧盟与美国。东盟五国 FDI 与中国仍有很大差距。

本文原题为“Don't Get Fooled by China's Tricky FDI Numbers, It is Still Number One”。Ryan Rutkowski 是彼得森研究所的分析师。本文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刊于 PIIE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向中国的金融系统注入一些风险

Nicholas Borst/文 黄懿杰/编译

导读：日前，中国批准成立首批 5 家民营银行；同时，“超日”债成为首支在国内发行的违约债券。本文作者认为，这两件事对中国金融系统都是好事，违约事件将逐渐纠正投资者的道德风险，而民营银行则作为扭转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试点。编译如下：

道德风险是中国金融体系目前正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在过去 10 年，有太多的例子表明投资者在金融产品违约时寻求政府干预。债券、信托产品、理财产品、房地产投资，甚至单个股票都曾出现类似“救市”现象。而且，道德风险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投资者，金融机构本身也频频成为政府救助的对象，并且以隐含政府担保的形式而获得持续的支持。因此，近期监管部门针对这些问题所迈出的两小步，也着实令人振奋。

首先，在投资者道德风险方面，政府最终允许一支公司债违约。以前也曾经发生过公司债违约，但这些债券是在海外发行，其损失由海外投资者承担。这次违约的是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超日”）发行的 5 年期公司债。在目前产能过剩的行业背景下，该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并不为怪。另一家被媒体详细报道的企业，无锡尚德 2013 年在某只国际债券上违约，目前正面临破产重组。

超日的违约影响虽小，但意义重大。公司看起来并不是资不抵债，只是缺乏流动性，且目前正在出售其海外资产以还本付息。但这一事件在中国债券市场上尚无先例可循。政府拒绝干预这起违约并未引发危机的传染，反而起到了改变债券市场潜规则的作用。如果监管机构保持在正确的道路上，投资者们将会缓慢地调整其对公司债的风险认知。这将会导致投资者们越来越谨慎，降低新债发行的速率，形成更具差异化的收益率曲线。

监管部门同样在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方面迈出了正确的一步。政府批准设立 5 家民营银行，分别位于天津、上海、浙江和广东。这并不是民间资本首次被引入金融市场，大型国有银行在之前的 IPO 时，就已经开始接受民间资本的注资。对于合资银行和城商行而言，民间资本的股权比例已经非常高，分别达到 45% 和 56%。然而，虽然已经拥有大量的民间资本，这些金融机构仍然与国有金融机构一样，在扭曲市场的政府隐性担保下运行。

这一政策的突破点在于创造了完全不受政府支持的纯民营银行。“市场化退出机制”这一论述首先出现在 2013 年的十八大文件中。但监管部门难以将这一改革应用到整个金融系统中去。作为替代，这些新创立的民营银行将成为试验品。在早期阶段，这些民营银行规模较小，破产并不危及整个金融系统。在小范围内，监管部门有试验金融机构清算机制的空间。

进一步地，更多民营银行得到批准将对中国金融系统产生显著影响。对比中国经济的其他部门，特别是国有资本仅占 25% 的制造业，金融业目前完全被国有企业所垄断。

如果能够得到公平的待遇，民营银行有潜力打入银行系统，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监管部门应该马上取消目前强加在民营银行之上的地理限制。目前，大型国有银行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广泛的网点服务，国际服务的完备程度也与日俱增。在目前的监管框架下，任何一家民营银行都难以与之竞争。

与大型国有银行相比，民营银行的竞争优势在于效率，以及原本服务不到位的客户。为了吸引存款，这些银行必须被允许设定更高的存款利率。然而，如果存款保险系统尚未就位，监管部门担忧存款利率竞争将会导致银行破产，储户的储蓄受损。因此，中国更有理由加紧步伐，加入到世界 113 个已有存款保险国家的行列中来。

本文原题为“Injecting a Little Risk into the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作者 Nicolas Borst 为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3 月 11 日发表于 PIIE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的区域与双边贸易协定

John Whalley, Chunding Li /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本文介绍了中国目前的贸易协定，并由此推测中国的相关谈判策略，以及这些协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编译如下：

中国对国际贸易谈判的热衷并没有随着加入 WTO 而停止。现在中国对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越来越积极。截止到目前，中国已经签订了 12 个区域贸易协定，还有 6 个正在谈判中，并正在考虑加入另外 4 个。

早期，中国主要和香港以及一些小的国家（如爱尔兰）进行贸易谈判。而现在考虑加入的贸易协定谈判规模都非常大，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等。当然，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追求建立双边贸易协定网的国家。但中国比任何一个大国经济体都更渴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大出口。

中国区域贸易协定的特征

中国有 12 个区域贸易协定伙伴，其中 11 个协议已经签署完毕。这 12 个贸易伙伴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联盟，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秘鲁，香港，墨西哥，台湾，哥斯达黎加、冰岛和瑞士。中国正在谈判或者考虑加入谈判的贸易协定对象都涉及到一些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TPP（12 个跨太平洋伙伴国家）、RCEP（13 个亚洲伙伴和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日本、韩国和印度。

在已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中，与香港和墨西哥的协议最为重要。原因如下：第一，使双方免受对方反倾销以及关税的政策，这类似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之间的豁免政策，有助于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第二，为香港服务公司在内地市场业务提供特殊安排。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协议也同等重要。这是因为这一贸易协定使 17 亿人受益，而且二者的经济合作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协调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

与美国，日本，韩国，印度以及 TPP 国家和 RCEP 国家的贸易协议将对中国的贸易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最近几年，美国一直指责中国是汇率操纵国，通过压低汇率来刺激出口，从而产生大量的贸易盈余。自 2005 年以来，人民币已经升值将近 25%，但美国的担忧依然存在。在新的贸易协定中，美国将会采取新的规定来应对国有企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中日之间的政治摩擦使中日韩的贸易协定谈判前景变得扑朔迷离。中印之间贸易的快速增长为二者签订

区域贸易协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来自印度方面的贸易保护主义使谈判变得举步维艰。

中国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策略

中国的区域贸易谈判策略灵活多样，视不同的伙伴而变化。起初，中国主要和本土以及一些小的谈判相对容易的国家签订区域贸易协议。这有助于贸易协定的快速签署，并为以后签署新的贸易协定奠定基础。2003年，中国和香港以及澳门签订了第一个区域贸易协议；2008年，和第一个发达国家新西兰签订了协议。除东南亚国家联盟之外，中国的12个贸易伙伴都是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但中国的自由贸易策略，最终是要与WTO的关键成员国签订贸易协定，这包括美国、欧盟、印度等所有的中国重要贸易伙伴。与印度的贸易谈判使中国更好的学习如何控制谈判进程，这有助于与欧盟，美国的多边贸易谈判。与欧盟，美国的多边贸易谈判，可以重塑世界贸易准则，使中国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中国自由贸易策略的另一个特征是双边投资协议。现在大概已经完成3000个双边投资协议，覆盖解决投资争端相关问题，保证投资者的资金汇回国内，减少投资者资金汇出的限制以及其他事项。这些协议一般在贸易协定之前或之后，作为一个单独的协议来进行谈判。然而，双边投资协议并未涉及管制投资流动的准则。考虑到中国对外投资的兴趣以及对外投资途径的增加，这似乎刚好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区域贸易协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的区域贸易协议以及未来达成的区域贸易协议会给中国的经济增长，贸易和整体经济表现带来多大影响？如果中国与所有的主要贸易伙伴签订区域贸易协议，并把现在10%的关税削减到0，那么区域贸易协定的中期影响就是贸易规模的一次性飙升。

目前，中国的问题依然是，在保持增长的同时如何维持贸易额快速增长20年。在这样的贸易策略下，一次性刺激贸易似乎很受欢迎，但并不持久。而且，从长期来看，这并不是解决增长问题的唯一方法。更多人的认为中国应该扩大国内消费来替代贸易的增长。

本文原题为“China's regional and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本文作者分别为 Western Ontario 大学的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员。本文于2014年3月5日刊于VOX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为什么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投弃权票？

R. S. Kalha/文 赵洋/编译

导读：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克里米亚归属问题所举行的表决上投了弃权票，但是这并不会影响中国同俄罗斯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国投弃权票是出于维护自身领土完整的考虑，但是也为西方国家所接受，因为这达到了孤立俄罗斯的目的。克里米亚问题客观上为中国制造了战略机遇，中国成为美国、俄罗斯和西欧各方争取的对象，而这也为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增添了变数。编译如下：

当中国在安理会因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投决定克里米亚的未来一事而举行的投票中投了弃权票的时候，西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就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其它安理会成员国都赞同西方的决议，因此它们可以宣布俄罗斯已经被完全孤立了。尽管中国同俄罗斯之间保持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习近平主席还将俄罗斯作为他就职之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他还参加了在索契举行的冬奥会开幕式，中国人仍然非常关注弃权票的后果。中国投弃权票的原因远远超越了当前手头所要处理的问题，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战略考虑。弃权票一点也不会影响中俄维持紧密互惠关系的意图。

中国反复重申，国际法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国家的领土完整绝对不允许受到侵犯，中国也一直坚定地支持这一原则。中国曾经反对孟加拉国的建立，也反对北约轰炸塞尔维亚以及随后的科索沃从塞尔维亚分离出去。中国同俄罗斯和印度一样，都不承认科索沃的独立，因此中国是采取了它一贯的对于民族国家的领土问题的立场。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所采取的政策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随后承认孟加拉国的独立，对科索沃则静观其变，而尽一切可能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我们从中国媒体的报道当中就能看出这一点，尽管这些报道有些迟疑。

中国采取这种立场是出于维护它自身的领土统一的考虑。中国的陆地边界同14个国家接壤（如果除去韩国的话就是13个国家），并且它还拥有大约一亿人口的少数民族，而且少数民族占据了中国大片的领土。汉族人构成了中国90%的人口，各民族的相处也是比较和谐的。但是中国两个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西藏和新疆则同印度以及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接壤，而这使得中国对这两个地区的形势的发展极为敏感。历史已经证明，由西藏作为战略重心的亚洲内陆地区总是会周期性地出现动荡。在过去，西藏的文化和宗教对于

中亚地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中国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但是还是不能完全打消西藏争取完全自治甚至是独立的念头。自从 2009 年以来，中国出现了 126 起藏人自焚事件。中国尝试了各种手段，从镇压到给与经济好处等等，而藏人对于独立的追求还是没有平息中国的愤怒。

在新疆，本地民族同中亚的国家和文化有重合，而且跨越边界的民族联系也十分紧密。这些民族共同体对于中国中央政府的忠诚度是非常低的。因此在新疆的政府和警察控制是十分成问题的，并且不能完全排除中亚共和国内部所发生的事情的干扰。上一周，中国媒体报道十余名新疆“分离主义分子”在昆明火车站持刀杀害了超过 29 名平民，重伤了大约 130 人。新疆地区的公安机关报告，在 2012 年大约发生了 190 起这样的袭击事件，他们承认在数量上相比于 2011 年有“显著的增长”。人们也承认维吾尔族“分离主义分子”开始袭击平民，而不仅仅是诸如警察局、警车或者是党政机构这种政府权威的“象征”。维吾尔的分离主义势力是受到热比娅·卡德尔的领导的，她目前在国外，但是还没有取得显著的影响力。

因此，很明显中国会在国际体系当中坚定地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容侵犯的原则。在这方面做出的任何放松都会影响中国的国内形势，以及它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完整性。俄罗斯声称克里米亚是从它那里“偷”去的，而这同中国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因此中国过去也曾经经历过“民族屈辱”，很多中国的领土都被那时候的帝国主义国家所“偷”去了。很幸运的是在中国外围的国家——除了印度和不丹是明显的例外——它们同中国的边界争议都已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解决了。

从另一方面来讲，在北京的中国战略家们对于在东欧发生的事情不会感到过于不快。现在俄罗斯同由美国领导的西方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因此美国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俄罗斯身上。在美国的主流政治当中，所谓的俄国威胁可能会成为一个话题，因此美国国会选举当中的每一个候选人都可能会在这一问题上采取极端的立场。目前，前任国务卿克林顿和前任副总统拜登都已经表现出了争夺总统职位的野心，他们也利用尖锐的词语批判俄罗斯，以此来推动对他们的支持。既然美国将普京和俄罗斯当作最大的敌人，那么在亚洲的中国就远算不上是敌人了。

习近平主席在 2014 年 3 月 22 日至 4 月 1 日将会访问西欧国家，而这也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现在欧盟和中国的贸易额已经达到了 5600 亿美元，同时随着西欧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的不断发展，西欧的领

领导人将会毫无疑问地对中国表达善意。习近平主席肯定会受到隆重的接待。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于，欧洲领导人是否会提出在中国发生的侵犯人权的问题，就像他们以往所做的那样，或者如果他们希望进一步“孤立”普京的话，所有这些“不友好”的问题都将从对话当中删去？

对于处于中国外围的民族国家而言，这也是一个试金石。美国看起来一直都非常关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争端、叙利亚乱局、伊朗核问题以及最近以来普京对乌克兰的敌意。尽管奥巴马总统非常明确地拒绝军事介入克里米亚问题，美国的外交关注重点也有可能再次转向欧洲。这就同欧洲发生的事情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重要议题这一逻辑相吻合。

因此，美国“重返亚洲”的未来路在何方？中国现在同时受到俄罗斯和美国的器重，能够仅仅通过做一个旁观者来取得一种独特的战略优势吗？

本文原题为“UNSC Vote on the Crimean Issue: Why did China Abstain?”。本文作者 R. S. Kalha 为前印度驻伊拉克大使。本文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刊于印度国防研究和分析研究院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平衡透明度和国家安全

Pieter D. Wezeman and Siemon T. Wezeman/文 马文龙/编译

导读：政府支出的透明度是议会和公民社会有效参与政治进程中的先决条件。但是当涉及到军事预算问题时政府往往不够透明，这会对民主和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在透明度和国家安全关切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可能有助于减少紧张和冲突产生的根源。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现编译如下：

各国政府认可透明度的必要性

军队是个别国家安全政策的关键因素，并通常被裹上神秘的色彩。然而，军事事务，包括国防政策、军费开支和军事能力等方面的透明度，通常被认为是各国之间建立信任和信心的一个基本要素。同时，透明度也可以帮助安全部队防止浪费性支出。此外，透明度也会促成民主监督，问责机制和资源分配等目标的实现。在许多国家，尽管这种透明度存在于许多或大多数的政府部门，但在安全和防务部门却存在着严重缺失。

国家间在相互交换有关军事能力信息方面有着广泛的正式协议，这可以帮助防止夸大威胁、曲解意图或行为、军事失误和过度或不稳定的军备集结。1980年全球对透明度原则的支持，促使联合国军事开支报告制度。随后，在1991年，联合国建立了常规武器转让登记制度。

几乎所有联合国成员国投票赞成这些计划，通过这些举措，联合国要求会员国提供有关军事开支和武器进出口方面的标准数据。然而，这两种机制都是自愿参与，尽管有着广泛的初期支持，但实际的参与率却非常之低。2012年，联合国的193个成员国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提交了有关武器进出口方面的信息，而报告军事开支的国家甚至更少。

各国议会报告的透明度正在提高。

虽然各国之间的透明度促成了几个与透明度相关的机制的建立，同时透明度的概念也获得了普遍支持，但是在国内有关国防政策透明度，军事预算或武器采购和销售方面却没有全球一致的有约束力的规则或指引。在大多数国家，军事预算以及武器采购和销售的信息被认为是高度敏感的问题。政府认为他们发布这方面的信息将有利于敌对政党的战略规划。因此，它们限制公众获取相关信息，甚至防止议会审查。

在实践中，透明度在军事问题上差别很大。许多国家的政府定期提供有关其

国防政策的信息(通过特定的报告,比如国防白皮书或年度预算)或公开声明(提供有关军事计划和军事结构和设备要求达到的目标等相关方面的信息)。然而,在大多数国家,军事问题已被保密,使建设性的公共或议会辩论,审查和输入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然而,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近几年拉美在军事预算和武器采购信息的全面性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而且大型投资项目往往只有在公开讨论后才做决定。例如,巴西在2009年决定购买潜艇(包括核潜艇)和2013年决定购买战斗机之前,都进行了好几年的公开讨论。非洲、亚洲和中东也有一些有限的改善。例如,支出和采购的细节经常在加纳议会辩论,印尼国会议员在军事预算和采购问题上变得更直言不讳。

军事事务的保密是一种错觉

许多国家的政府认为军事预算应该保密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认为这些信息不应该被允许落入潜在的敌对势力手中。然而,维持军事开支和关键的军事采购项目的保密是不可能的。例如,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有关军事预算和国际武器转让方面拥有45年的信息收集经验。开放源,包括官方或非官方的,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主要武器采购方面提供了丰富信息。如果像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这样的研究机构用最少的资源和只利用公开信息工作,就可以高度全面和准确地计算出全球军事开支和武器转让情况,那么国家情报机构显然可以获得更多的相关信息。

因此,政府不能做到完全保密,而只能实现局部保密。这实际上可能在国防、国家资源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军事设施的合理配置问题上引起令人更加困惑的争论。而不是让一个在本国或邻国的不太确切的讨论和决策所指引,一个更加开放的方法将有助于建立信任,并且有助防止对国家意图的防止误解和误判。否则将会导致资源的浪费,腐败的滋生和国际关系的紧张。

另外因为军火贸易数据的公开性,越来越多的主要武器供应国认为,保密是一种错觉。因此,他们已经开始向本国议会和公众提供武器出口方面的官方信息。这样的信息共享不会危及国家安全利益,相反,为了确保公民社会的理解和促进负责任的武器出口政策的形成,从而避免造成或加剧冲突,这是相当必要的。

超越浪费文化

保密的军事预算和采购也有可能造成经济浪费。它会导致不必要的收购和减少责任,并滋生腐败和增加军事装备价格的不确定性。最终,保密很可能导致危险和挥霍无度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建设。透明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增加的责任。

没有议会可以在不透明的军事预算和采购中发挥其作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各国政府在平衡发展与安全之间的稀缺资源时，往往面临艰难的选择。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只会加剧这一困难。希望在2013年达成的新的武器贸易条约能够发挥积极作用，这将为增加武器贸易的透明度提供新的动力。

然而，透明度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相反，它是促进有关国家和国际重要性的问题进行讨论的一个工具。此外，在缺乏一个包括所有利益攸关者，并且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在国防政策、预算和采购方面做出明智决策的这样一个环境的情况下，军事事务的透明度在公共关系不会起多大作用。

本文原题为“Balancing transparency and national security”。本文作者理彼得 D.魏泽曼和西蒙 T.魏泽曼（Pieter D.Wezman and Siemon T.Wezman）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武器转让项目资深研究员，本文于2014年1月14日发表于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西方国家需要针对俄罗斯的弱点采取新的威慑战略

John. Lough /文 周乐/编译

导读：乌克兰局势持续升温，本文中俄罗斯欧亚问题专家约翰·洛（John. Lough）就西方对俄罗斯的下一步动作应采取的措施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当前西方最主要的是要给予乌克兰一定的经济支持并针对俄罗斯在经济方面的软肋，向莫斯科释放一定的威慑信号。编译如下：

目前西方国家正越发地意识到这样一个现实：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诉求远不止是会影响乌克兰领土完整这么简单，俄方的行动已经给欧洲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次危机中莫斯科的态度很可能就决定了乌克兰的未来。

最近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表明，当前西方的威慑模型在欧洲区域内对俄罗斯已很难形成有效的遏制，而且在本次危机中核威慑的存在也没有展现出太多的意义。尽管俄罗斯一直声称北约对其国家安全存在着极大的军事威胁，但现在看来这种威胁似乎并没有对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事件上的态度有太大影响。根据莫斯科的推测，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不会对莫斯科给予过多军事上的回应，因为他们不太可能冒战争的风险与俄罗斯进行互动。当前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防止俄罗斯对乌克兰周边其他一些形势不稳定的地区采取对克里米亚的似战略，导致这些地区做出类似的战略选择。

到目前为止，西方对乌克兰的局势还只是在战术层面上做出了一定的回应。美国和欧盟已经签发了禁令，并且冻结了与克里米亚相关的一些俄方个人资产，这是西方国家希望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进行约束的第一个迹象。对此，美国的想法是，希望能尽量在不影响美俄贸易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行动，而相比之下，28个欧盟成员国就很难在该问题上达成一个完全的战略共识。尽管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有所行动，希望能在本次危机的博弈中奋起直追，但就目前的局势看来掌握着战略主动权的仍然是俄罗斯。为了扭转局势，西方国家需要在短期内达成一致的意见，并决定是否要做出一定的实质性动作来阻止乌克兰的独立限制俄罗斯的行为。此外，西方国家还要评估的另一点是，在他们对乌克兰政府做出任何承诺之前，乌克兰本国的领导集体是否真的有能力带领本国走出目前的政治危机。但不幸的是，现在这还是一个未知数，也就是说乌克兰的政客们究竟能不能不负社会期望，在危机中展现应有的领导力还不得而知。为此，西方需要采取以下两方面的行动：首先，向乌克兰提供紧急财政资源以期为其经济复苏创造条件；其次，让乌克兰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国家的未来，自己处理本国的事务。

然而，上述的这种方法在实施上有一个不稳定因素，那就是必须要面对莫斯科对乌克兰事务的干涉。当前俄罗斯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莫斯科认为乌克兰不应该结盟，更不应该与欧盟签订协议或是加入欧盟，并认为乌克兰应该在一种联邦制下以自治区的形式来行使自治的权利，事实上这样做的话无疑会剥夺乌克兰作为国家的独立性。

尽管去年俄罗斯通过推出一系列的贸易禁令而成功阻止了亚努科维奇与欧盟签署协议，但到现在为止莫斯科仍然没有给乌克兰政府带来新的经济工具帮助其回复经济。另外乌克兰东部地区是不克里米亚，俄罗斯将很难通过同样的方式将其从乌克兰剥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精英将很可能会选择与基辅的中央政府保持一致。

面对当前压力重重的危机局势，西方国家需要迫使莫斯科做出选择，这需要找准俄罗斯的一个软肋并对其形成威慑。尽管目前俄罗斯在乌克兰西部存在着一定的竞争优势，并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杠杆对乌克兰进行影响，但对大宗商品出口的依赖性和持续的经济停滞也使俄罗斯自身倍感压力。因此在于与俄罗斯的决策者进行博弈的时候，西方政府需要释放出一个针对俄罗斯的可信的威胁信号，并让莫斯科相信西方有能力采取各种制裁措施对俄罗斯经济造成持久而严重的损害。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到目前为止，国际战略的理论研究中并没有涉及到如何结局当前的危机。因此，如果西方领导人想要切实影响到莫斯科决策者的行为，那就需要找到一种能表达其真正战略意图的语言，这种语言必须要超越“制裁”和“可能的针对性措施”这样的说法，让莫斯科深刻理解到，如果俄继续破坏欧洲的安全，那么西方一定会采取短、中、长期政策来不断削弱俄罗斯的经济。

本文原题为“The West Needs a New Form of Deterrence that Targets Russia’s Weaknesses”。
本文作者为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曾在北约信息新闻办就职，致力于俄罗斯能源外交和俄罗斯欧盟关系研究。本文于2014年3月刊于CFR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促使形势不利于朝鲜

Bernard Gwertzman /文 赵洋/编译

导读：联合国的一个专家小组裁定朝鲜犯有反人类的罪行，而中国则谴责这份报告的内容不正确。中国更关心的是朝鲜去核化而不是它的人权状况。为此，对外关系委员会采访了朝鲜问题高级专家斯科特·斯奈德（Scott Snyder），而后者认为美国和中国是否能共同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仍然有待观察。编译如下：

朝鲜刚刚被一个联合国专家小组裁定为犯有反人类的罪行，而联合国高级人权顾问纳威·皮莱（Navi Pillay）则推动将朝鲜告上国际刑事法庭。然而中国认为这份报告是错误的。对外关系委员会朝鲜问题高级专家斯科特·斯奈德（Scott Snyder）指出，中国对于给朝鲜施加压力迫使它放弃核武器更加感兴趣，而不是为它的人权纪录而惩罚它。中国希望推动朝鲜去核化，同时又不动摇它的体制，但是“美国和中国是否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来共同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仍然有待观察”。

问：你对这份言辞激烈的报告的印象是什么？

答：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它收集了很多证据来证明朝鲜政府的罪行。它的编写方式使得它可以被用作正式的法律证据，来证明朝鲜政权及其领导人是否犯有反人类的罪行。这是一份重要的证据，在理论上可以在未来在国际刑事法庭上使用。委员会的做的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它直接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报告的内容。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持续下去，那么金正恩个人也是有责任的。同时，它也可以引导金正恩改变朝鲜的现行体制以及它对于人权的侵犯。

问：但是如果要产生效果，这份报告就必须在安理会通过，是这样吗？

答：是这样的。调查委员会将在三月中旬正式将报告传达给人权委员会，而人权委员会很可能会投票来决定是否将它转交给安理会讨论，这可能会在今年秋天进行。中国公开反对这份报告，并很可能会行使否决权。现在仍然不清楚报告是否会出现安理会的议事日程上。

问：美国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推动决议的通过吗？

答：如果有安理会其它成员支持，美国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使其列入安理会的议事日程。而这就意味着安理会将展开正式讨论，并且投票表决是否要将

报告转交给国际刑事法庭。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关注朝鲜的人权问题，但是它的主要目标仍然是说服朝鲜放弃核计划并且重返六方会谈。

问：朝鲜核计划的现状如何？

答：朝鲜宁边的核设施处于活动之中，并且很可能正在为核武器制造更多的原材料。有报告称朝鲜正在改进其卫星发射场，也有报告称朝鲜可能会准备进行第四次核试验。现在看起来这些事在短期内不会发生，但是朝鲜过去没有自我约束的先例。

问：现在中国人说他们也希望朝鲜停下来，是这样吗？

答：是这样的。就中国而言，最有意义的进展在于 2013 年在加利福尼亚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表明朝鲜的去核化是美国和中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很明显，中国对朝鲜去核化的推动必须在维持朝鲜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但美国和中国是否可以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来共同给朝鲜施加压力仍然有待观察。

问：因此你不期待中国会在人权问题上给北朝鲜施加强大的压力？

答：不期待。在追求这些目标方面，美国和中国所偏好的方式非常不同，美国所考虑的施加制裁和压力的程度比中国更大。在人权问题上，没有证据表明双方的态度是一致的。事实上，委员会调查报告有一部分涉及中国，指出它遣返朝鲜难民并且否认他们有政治理由离开北朝鲜。

问：来谈一点关于北朝鲜领导层的事情吧。我们对于年轻的领导人金正恩了解得很少，而他刚刚在 2013 年 12 月处死了他的姑父和顾问张成泽。

答：这件事很复杂。今天的朝鲜在金正恩的统治下，在政治上比过去更加稳定还是加脆弱，尚不能确定。可以确定的是，张成泽被清除是朝鲜领导层分裂的明显标志，毫无疑问也是虚弱的象征。但是就金正恩施政的权力和能力而言，没有证据表明在朝鲜内部有人有能力可以直接挑战他。

问：金正恩还没有访问过中国。中国人对他很冷淡吗？

答：也许很多人预期去年年底金正恩会访问中国，但是被张成泽事件打乱了。张成泽是中朝关系的主要操盘手之一，因此中国内部很可能也在进行调整，以便相应地协调对朝政策。

让金正恩获得脸面可能是中国最有效的制衡朝鲜的杠杆。因此中国领导人很可能会保证这一杠杆被尽可能有效地使用，以便阻止朝鲜采取同中国国家利益相

矛盾的挑衅行为。因此在我看来金正恩访问北京的代价应该是朝鲜坚定地承诺重返去核化的道路上来，这也包括重启六方会谈。朝鲜必须在言辞和行动上都要追求去核化——包括允许 IAEA 监督人员返回宁边以及将它的核计划向第三方公开，以便能够在事实上推动它走向无核化。

本文原题为“Making the Case Against North Korea”。本文作者伯纳德·韦格茨曼（Bernard Gwertzman）为外交政策委员会咨询编辑，被采访者斯科特·斯奈德（Scott Snyder）为朝鲜问题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刊于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简介：1964年由美国海军上将阿利·伯克和大使大卫·阿希尔成立。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团。CSIS主要就经济和安全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政治战略分析，其重点放在技术、公共政策、国际贸易和金融、能源等。在《2012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2）中，CSIS在全球（含美国）150大智库中列第5名，全球5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1名。

网址：<http://csis.or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在全球（含美国）150大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8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24名，全球5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7名。

网址：<http://www.cfr.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2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2）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150大智库中列第8名，全球8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5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1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的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2）中，PIIE在全球（含美国）150大智库中列第15名，全球8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5名，全球5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3名。

网址：<http://www.iie.com/>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 1983 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 28 个国家的 237 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 是 CEPR 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在《2012 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2）中，CEPR 在全球（含美国）150 大智库中列第 27 名，全球 8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18 名。

网址：<http://www.voxeu.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http://www.cigionline.org/>